

竞争·改革·进步

战国历史反思

刘泽华
李瑞兰

求实出版社

竞争·改革·进步

战国历史反思



刘泽华

李瑞兰

求实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旭畅

封面设计：张志明

竞争·改革·进步

战国历史反思

刘泽华 李瑞兰

*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25印张 207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7-80033-032-X/K·12

定价：2.25元

卷 头 白

改革、改良、改制、变法、维新、更化等不同说法，细加分辨或有不同，但大致都是在社会秩序、特别是政治秩序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由上而下试图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界对这些虽不是全然否定，但基本倾向是轻蔑的，对其作用常常估计不足。充分估计革命的历史作用是有道理的，但对改革的作用同样也不应忽视。不少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比某些草率的革命逊色。应当承认，革命和改革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上的改革，都有促成其进行的客观形势，但领导者的见识和决心常常更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富有成效的改革者的历史作用应该同革命家一样，永彪青史。

战国时期的改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明显的，当时一些改革者的历史贡献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战国时期列国的改革丰富多彩，是很值得回顾的历史一页。其中，既有喜剧，也有悲剧，还有闹剧；有真心改革图强者，有潮流推动下的被动者，有假改革之名别有它求者，有玩弄改革者，有中途而废者，也有反对者……这些说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们把这本小书定名为“竞争·改革·进步”，显然名实不符，但我们确实想通过对战国改革的述评说明这个道理。

人是历史的产物，如果不认真思考历史，就只能囿于历史，因此，历史著作不应该把人们带回到历史，而应该同读者一起设法走出历史。这本小书在这方面如能对读者有所裨益或引起思考，我们就感到满足了。

作 者

1987年12月

目 录

卷头白	(1)
第一章 战国——竞争与存亡的时代	(1)
一、由“春秋”到“战国”	(1)
历史的回顾	(1)
由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3)
二、“诸侯力政，争相併”的大势	(12)
当权者权势欲的膨胀	(12)
“争相併”对改革的要求	(14)
三、经济领域的新面貌与新问题	(16)
生产与交换的新条件	(16)
经济与政治的和谐与冲突	(22)
四、在动荡中变化着的社会思想	(25)
“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	(25)
“士”的崛起	(29)
由神文到人文的思维转向	(34)
第二章 接连不断的列国变法	(40)
一、首开局面的魏文侯、李悝变法	(40)
四战之国	(40)
魏文侯的尊贤与用贤	(42)
李悝变法	(56)
魏国的首强	(63)

DK 82/31

二、昙花一现的楚悼王、吴起改革	(65)
悼王求贤与吴起入楚	(65)
短暂的改革与强盛	(66)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	(70)
三、划时代的秦孝公、商鞅变法	(72)
在困境中奋起的秦国	(72)
商鞅三会秦孝公	(74)
改革和守旧的大辩论	(77)
第一次变法令	(81)
第二次变法令	(98)
秦国的巨变	(105)
商鞅身死秦法未败	(108)
四、别具风格的齐威王改革	(112)
田齐的危机	(112)
邹忌与淳于髡的喻谏	(113)
威王新政	(116)
齐国大治	(122)
五、韩昭侯、申不害用术	(122)
申不害相韩	(122)
以“术”为主的政治改革	(124)
一时的稳定与和平	(130)
六、威震中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31)
赵国的发展与羁绊	(131)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重大决策	(133)
多种途径发展骑兵	(140)
灭中山略胡地	(143)

七、兴燕破齐的燕昭王、乐毅改革	(146)
燕王哙的禅让与燕的削弱	(146)
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148)
乐毅助昭王改革	(150)
“东县齐国，南尽中山”	(152)
八、其它小国的改革	(154)
第三章 在改革中前进的战国社会	(157)
一、新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形成	(157)
中央集权政体的形成	(157)
地主封建制的产生	(162)
国家授田制的完善	(169)
二、社会生产的长足进步	(173)
农业生产的突飞猛进	(173)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182)
商业的持续上升	(190)
改革与工商业发展的关系	(194)
三、统一战争的加速发展	(198)
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198)
统一战争三个阶段	(199)
由秦实现统一的历史原因	(202)
四、百家争鸣和认识的空前飞跃	(206)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206)
认识领域的累累硕果	(208)
多种政治学说并存的历史作用	(232)
第四章 列国改革的再探讨	(235)
一、改革成败得失散议	(235)

君主与改革集团的决心、魄力与改革 的成败	(235)
把握社会发展趋势与改革的成败	(238)
创新精神与改革的成败	(243)
改革中的真真假假与改革的成败	(245)
改革者的悲剧与历史的进步	(247)
二、智能与改革	(249)
智能在竞争中的作用	(249)
争购智能的热浪与手段	(251)
排斥、压抑智能的诸种社会因素	(259)
不同类型智能与改革的关系	(264)
三、改革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268)
改革者与守旧者的矛盾	(268)
改革与社会成俗的矛盾	(271)
改革的狭隘性与民众的矛盾	(273)
改革与权力分配的矛盾	(275)
历史就是矛盾的运动	(278)
四、改革与社会发展	(280)
改革与七雄的兴衰	(280)
改革与社会的发展	(283)
结束语	(284)

第 一 章

战国——竞争与存亡的时代

一、由“春秋”到“战国”

历史的回顾

公元前1027年，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王朝鼎革的大事变。这年正月，兴起于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族，在其杰出首领周武王的统帅下，联合周围一些部族，东渡黄河，陈兵牧野，一举攻克商都朝歌，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周王朝。

为了治理幅员辽阔的新征服区，自武王及其胞弟周公旦起，周人推行了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大批同姓子弟、姻亲、少数异姓功臣和古帝王之后为诸侯，在各地建立起大小数百个封国，在周王室的号令下，分区而治，共辅王室，有效地实现了周族对全国的统治。

但是，岁月无情。曾几何时，这种在周王朝开国之初曾起过保证王室对四土控制作用的分封政体，却走向了它的反面。诸侯渐渐尾大不掉，权力重心不断下移，王室日见衰微，以至最终演成了长达500年之久的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局面。

分封制对于周王朝，何以前后会起相反的作用呢？这要

从分封制下的政治结构和决定权力重心的关键因素谈起。

在分封制下，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标榜的周王朝实际是一种邦国联合体，众多邦国与周王室的从属关系完全取决于周王室实力强大与否，强则从，弱则离，并无一定。分封之初，周王室势强，众邦国势弱，尤其是直接由周王室“授民授疆土”的同姓或姻亲封国，在政治上和血缘宗族上对王室有着很强的依附关系，故大都俯首听命。不过，从政治体制上看，这些封国并非王室的派出机构，而是在各方面都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各封国都有一套与周王室大体相仿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如仿照王室设官建制，组织军队，征收赋役，由嫡长子继承君位，以及分封国君的旁庶子弟或亲信功臣为下一级封君——卿大夫等。这就使封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相当的自治性。随着岁月的流逝，封国对王室的恩典和血缘上的亲近感逐渐淡化，而欲摆脱王室的羁绊，要求独立化的倾向却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疆域大、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当权者统治能力强的诸侯国，这种倾向就更为强烈。

与上述趋势相反，周王室的实力在分封制下则日趋衰落。其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作为王室经济支柱的王畿土地，由于不断分封，势必渐遭肢解，经济实力相对削弱；其二，王室对不服命的邦国需要经常出兵征讨，军队时有损耗，军事实力亦难永葆优势；其三，宗法原则所规定的嫡长子王位继承法下的周天子，并非个个都是文王、武王、周公那样文韬武略、样样具备的英主，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者有之，昏昏蒙蒙无所作为者有之，骄奢贪暴荒淫凶残者有之……这致使“王道微缺”，天子威信下降，难以驾驭邦

国。

在开国之初，武王、周公、成王、康王之世，周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周天子君临天下，诸侯莫敢不听。但到第四代天子周昭王时，就出现了“荒服者不朝”，即边远地区的部族不再依臣礼按时朝贡的局面，尔后发展到内地诸侯亦伺机违抗王命，“或不朝，相伐”，王室不能制。到第十一代天子周宣王时，虽曾力图有所振兴，但终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诸侯坐大、王室衰落之势。其子幽王继位后，“使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政治愈加腐败，加之戎狄交侵，天灾横流，国势日益危蹙。幽王还宠爱艳妃褒姒，废嫡立庶，引起原王后之父申侯的反叛。公元前771年，申侯纠合缯国，勾引早已为患宗周的犬戎，兵临都城镐京。幽王败死于骊山脚下，镐京遭到乱军的无情践踏，“流遍了，郊原血”。

第二年，被几家诸侯拥立起来的周平王，迫于都城残破、犬戎威逼的形势，只好告别祖先经营300年之久的宗周故地，由赶来勤王的晋、卫、秦、郑等诸侯护送，迁都于位于伊、洛流域的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平王东迁是周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分水岭。历史上，将此前的周王朝称为“西周”，此后的周王朝称为“东周”。东周又依政治形势的发展，划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平王东迁至三家分晋）叫“春秋”，后期（自三家分晋至秦统一）叫“战国”。

由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东迁以后，周王室一落千丈。不唯王畿大为缩小，诸侯亦早已不按时贡献，王室经济遂日见困窘，以至时常伸手向诸侯乞讨。如周平王死后，他的孙子桓王继位，因筹划不出

丧葬费，被迫向鲁国求乞。武力方面，原来天子有“六军”，此时减少到不足一军，连一个中等诸侯国都不及。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其实已徒具虚名，他发号的施令已无人听从。于是，“王纲解纽”，天下大乱，诸侯为争夺土地和人民，不断相互攻伐，小国朝不保夕，大国贪得无厌。不过，由于当时社会上尊祖敬宗的观念还很强，周天子虽已威风扫地，但毕竟是久为天下公认的“大宗”和“共主”，因此，一些强国便以“尊王攘夷”（匡扶王室，抵御游牧部落对中原的侵扰）相号召，利用周天子这块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展开了争当霸主的角逐。西周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一变而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大国争霸，目的旨在利用“霸主”的地位，获取过去周天子才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胁迫中小国家服令并向其缴纳贡赋。争霸的手段无非是战争。而要在战争中取胜，就需要足够的实力。要增强实力，就要实行改革。故春秋时代的霸者大都是倡导改革的先驱。

最早称霸的齐国，地处今山东省东北部，南有泰山，东北临渤海，地域辽阔，富于渔盐之利。西周末至春秋初，它吞并了附近的莱夷、根牟等小邦，成为海岱间一大强国。公元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任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经济上实行“相地而衰征”^①，按土地肥瘠定赋税之轻重，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又设铁官、盐官，由国家组织炼铁、煮盐，发展手工业；设“轻重九府”，由官府垄断主要生活用品的贸易，保证了财源。同时，用“叁国伍鄙”制^②整顿

①② 《国语·齐语》。

行政和军事。制国（国都以内）为二十一乡，其中商工之乡六，士乡十五，制鄙（国都以外）为五属，即把郊外的地方分成五区，士、农、工、商不得杂处，有利于行政管理。工商之乡和鄙之五属不服兵役，把服兵役的士乡十五分为三，五乡为一军，共三军，每军10000人。此即“叁其国”。军士平时居住集中，互相熟识，这样，就组成一个“行同和、死同哀”的战斗集体，加强了军事力量。此外，还用“三选制”^①选拔人才到政府供职，并招纳天下“贤士”为齐效力。这些措施使齐国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军事强大。桓公遂“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率领华夏诸侯，北御戎狄，南拒强楚，使燕、邢、卫等国免亡于戎狄之患，又助周襄王即位，安定王室。于是齐国被周天子和中原列国尊为诸侯之长，首霸中原。齐桓公死后，诸子争立，国力削弱，齐丧失了霸主地位。

继齐之后称霸中原的是晋国。晋本位于晋南汾浍流域，春秋初年，国土尚为狭小，且内乱不已。晋武公即位后，内部才告统一。其子晋献公时，加强了君权，积极对外扩张，

“并国十二，服国三十八”，把晋国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张到了南岸和西岸，成为中原头等大国。他的后继者相继进行了一些改革，使春秋前期的晋国很富有生气。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当政，任用赵衰、狐偃等能臣，进一步改革内政：

“明贤良、赏功劳”^②，选拔贤才治理国家；“轻关易道，通商宽农”^③，减轻关税，修筑道路，发展农业和贸易，使

① 《国语·齐语》。

②③ 《国语·晋语四》。

晋国百业俱兴，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建立上、中、下三军，抓紧训练士卒，整顿军纪，为对外开拓作准备。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王子带谋位之乱，晋文公出兵杀王子带，护送周襄王回銮，抓住了尊王这面旗子，在中原诸侯中初步树立了威信，并得到许多土地。公元前632年，晋又率秦、齐、宋等国，与力图向北发展的楚国大战于城濮，获得全胜，从此声威大震。于是，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迫使周天子封他作了“侯伯”（即霸主）。

在晋称霸前后，其西邻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开始虎视中原。秦人原是西北一支游牧民族。西周初期，其祖先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于秦地（今甘肃天水附近）作附庸，因姓嬴，号曰秦嬴。周宣王时，非子之孙秦仲始被列为大夫。幽王末年，犬戎乱周，兵临镐京，秦仲之孙秦襄公将兵相救，又护送平王东迁，有功于周室，才被正式立为诸侯。平王并许以当时尚为犬戎占领的岐山以西之西周故地作为秦之封土。襄公及其后代经过艰苦奋斗，把平王的许诺变成了现实，驱逐了西戎，控制了岐山以西广大地区，并吸取周人的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变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国势渐强。继位的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年）雄才大略，注意招徕贤才，任用百里奚、蹇叔等能人为谋臣，修明内政，奖励生产，训练军队，国力发展很快。穆公欲打出关中，耀武于中原。但秦东向的企图总受到晋国的阻拦，多次与晋交锋，负多胜少。穆公晚年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向西发展。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①，占据了原属戎马纵横

① 《史记·李斯列传》。

的甘肃东南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使秦成为雄踞西方的大国。

地处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原是南方古国。西周初年，其首领熊绎接受周成王的子爵封号，作了周的属国。但周天子总以“蛮夷视之”，不许其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楚人不满，遂起而与周王室抗争。周王室一再兴兵相讨，但强悍的楚人很难制服。春秋初期，齐桓、晋文相继称霸之时，楚亦不断对外扩张，蚕食了汉水流域诸姬姓小国和四周一些蛮夷小邦，力量不断壮大。楚本欲涉足中原，但北进的锋芒先后为齐桓、晋文所挫，未能得逞。楚庄王即位后（公元前613—前591年），消灭了宗法大贵族若敖氏，加强了王权，并提拔了一批出身低微但有才干的人参与国政，特别是请了一位有贤才而不愿作官的隐士孙叔敖出任令尹（即相），改革内政，论功行赏，使“举不失德，赏不失劳”^①，清明吏治；又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商农工贾，不败其业”^②，国势蒸蒸日上。此时正值晋国内乱，霸业中衰，北方没有了强有力的对手。庄王遂于公元前606年挥师北上，伐陆浑之戎，一直打到洛邑边上，并派人向周王询问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之轻重，显示其代周之志。后来，楚又连败郑、晋、陈、蔡、宋等国，终于饮马黄河，会盟诸侯，被齐、晋等大国之外的多数中原国家尊为霸主。

伴随着大国争霸的喧嚣声，是紧张的领土扩张过程。齐先后灭掉30余国及一些部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40余国及一些部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20余国，征服40

①② 《左传》宣公十二年。

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在函谷关以西吞并众多小国和部落，成为西方大国。西周以来邦国林立的局面大为改观，古代中国逐步向区域性的领土和政权的集中过渡着。

春秋后期，兴起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先后北上中原称霸。但大国争霸，此时有如强弩之末，已近尾声。原因是：春秋后期，各国的卿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开始以咄咄逼人之势威胁公室，致使大国内部矛盾上升，无暇外顾。

卿大夫原本是周代分封制下由各国诸侯分封的二级封君，春秋时期，诸侯在对外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加速了对内分封的步伐，各国卿大夫阶层逐渐膨胀起来。在诸侯的对外战争中，卿大夫要率领封邑中的武士参战，其武装力量得以加强；各诸侯国的武臣都由卿大夫担当，久而久之，他们出将入相，具有了左右朝政的政治资本；加之其封邑内的宗族、人口、土地一般设邑宰、家臣管理，不再象诸侯那样再行分封，经济实力亦日趋稳步增长。于是，他们中的强者便步诸侯争雄、藐视天子的后尘，不再把国君放在眼里，开始专擅国政，争夺土地，逐君、弑君，日欲凌驾于公室之上并取而代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又一变而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

“公室”卑微，政在“私门”，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有的诸侯国被卿大夫完全篡夺或瓜分了政权。“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便是典型。

齐国田氏的始祖叫陈完，原是春秋初年陈国国君厉公的公子，因内乱逃往齐国，齐桓公任命他作了“工正”（管理工匠的官职），从此他定居齐国，并改名叫“田完”。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田完死，谥号“敬仲”。田敬仲